

由史料热谈治史方法

旷新年

一、学术专业主义

现在有一种比较显著的倾向,就是对档案、史料的热衷,甚至被当成了一种学术新潮。其实,重视史料,这既不新,也不旧,而是学术的常规,永恒的方法。俗话说,有一分证据说一分话。但是,对史料用不着盲目崇拜,更不要被某些无厘头的说法吓倒。

按照韦伯的观点,现代化的本质是合理化。现代通过不断的合理化而达到最大效率。合理化渗透了现代社会的各个方面。体现在学术领域,就是知识的不断分化,学术的合理分工,分科研究和学术专业化。专业主义是现代学术的根本特点。凡是不专业化的,都必须做好被消灭的准备。韦伯在他著名的《以学术为业》的演讲中说:“我们这个时代,因为它所独有的理性化和理智化,最主要的是因为世界已被除魅,它的命运便是,那些终极的、最高贵的价值,已从公共生活中销声匿迹。”⁽¹⁾

兰克被称为现代史学之父,被视为实证主义史学的始祖。但是,正如我们简单地把韦伯理解为现代化论者是片面的一样,把兰克史学理解成为实证主义史学也是片面的。无疑,兰克认为历史研究要全面占有材料。1933年,法国著名汉学家伯希和在中国学界名流面前公开赞誉陈垣与王国维为中国两位世界级的学者,成为一时传颂的佳话。而陈垣在史料上以“竭泽而渔”的方式令人生畏,其结论往往不可移易。

中国有伟大的历史传统,历史学家无不重视材料的搜集,特别是努力获得直接的第一手材料。中国最伟大的史学家司马迁在《史记》自序中叙述了他撰写《史记》一书的准备工作:“年十岁则诵古文。二十而南游江、淮,上会稽,探禹穴,窥九疑,浮于沅、湘;北涉汶、泗,讲业齐、鲁之都,观孔子之遗风,乡射邹、峰;厄困鄱、薛、彭城,过梁、楚以归。”⁽²⁾

在柏拉图这样古代的形而上学家看来,现象和偶然的、变化的东西是没有价值的。现代,本体论和形而上学的地位发生了动摇,人类踏入了时间的河流,历史

开始受到重视。杰姆逊有一个著名的观点——“永远历史化”。

章学诚和章太炎讲“六经皆史”。傅斯年认为,历史学就是史料学。在某种程度上,傅斯年的《史语所工作旨趣》成了一个学派宣言,中研院史语所成了中国现代的一个学派,就是科学派史学或新考据派史学。但是,由于这一派的研究过于依赖材料,不仅治学偏畸,而且容易导致垄断材料的不良风气。比如,胡适一直秘藏垄断乾隆甲戌本《脂砚斋重评〈石头记〉》,直到临死前才影印出版,因此受到周策纵批评。

20世纪80年代,我还在读大学的时候,就听说过有人垄断闻一多的材料,秘不示人,视为秘密武器。后来听说,近代一位重要学人全集的编者,为了能够使自己可以“新材料”显示于人,一直拖延全集的出版,直到他自己写的书出版以后,这部学人的全集才得以出版。学界也经常称赞某位学者发现了“新材料”,哪怕“新材料”实际上并无意义。这种对“新材料”的过分追求容易将学术引向邪路,甚至死胡同,阻碍学术的健康、正常发展。

依赖秘密材料不是学术的通途大道,终究不能大成。严耕望说:“新的稀有难得的史料当然极可贵,但基本功夫仍在精研普通史料。新发现的史料极其难得,如果有得用,当然要尽量利用,因为新的史料大家还未使用过,你能接近它,最是幸运,运用新的史料可以很容易得到新的结论,新的成果,自是事半功倍。所以很多人把自己所能得到的新史料据为己有,自己研究,不肯示人,更不肯早发表,让大家来研究,这是很不好的现象,很不好的行为。然而所以有这种自私恶劣,主要的还是由于一般研究学问的人过分强调新史料的重要性,忽视了旧的史料,尤其忽视普通的旧史料,他们以为旧史料,旧的普通史料没有什么价值了。其实不然,我的想法,新史料固然要尽量利用,但基本功夫仍然要放在研究旧的普通史料上。研究历史要凭史料作判断的依据,能有机会运用新的史料,自然能得出新的结论,创造新的成绩,这是人人所能做得到的,不是本事,不算高

明。真正高明的研究者,是要能从人人所能看得到,人人已阅读过的旧的普通史料中研究出新的成果,这就不是人人所能做得到了。不过,我所谓‘说人人所未说过的话’,绝不是标新立异,务以新奇取胜,更非必欲推翻前人旧说,别立新说。最主要的是把前人未明白述说记载的重要历史事实用平实的方法表明出来,意在钩沉,非必标新立异!至于旧说不当,必须另提新的看法,尤当谨慎从事,因为破旧立新,极易流于偏激,可能愈新异,离开事实愈遥远。”不仅钱穆等历史大家,即使被金岳霖认为无所不知的陈寅恪也是使用常用的书、普通的材料:“陈寅恪先生,他懂得的语文极多,能接触到新史料的机会应该也不少,但他一生的论文中运用新史料写出来的也不算多。他的主要成绩也是从普通史料中抽绎出来的。尤其有关唐史的三部重要著作,《政治史述论》与《制度渊源略论》两稿,主要史料固然不外乎两部《唐书》与《资治通鉴》,就是《元白诗笺证稿》也只引用人人所能看得到的书,很少新的资料。这几位学人的治学方法与成绩,都可说是‘看人人所能看得到的书,说人人所未说过的话’。”⁽³⁾

在文学研究方面,鲁迅与胡适分别体现了两种不同的治学方法与路径。鲁迅在批评郑振铎的研究方法的时候剖析了两家不同的方法:“郑君治学,盖用胡适之法,往往恃孤本秘笈,为惊人之具,此实足以炫耀人目,其为学子所珍赏,宜也。我法稍不同,凡所泛览,皆通行之本,易得之书,故遂孑然于学林之外。”⁽⁴⁾

学术研究与材料确有密切关系,陈寅恪甚至说:“一时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取用此材料,以研求问题,则为此时代学术之新潮流。”⁽⁵⁾学术和钱、和经济基础有直接关系,但鲁迅所说的“恃孤本秘笈,为惊人之具”,是有钱人的学术。这种富家翁的学术实际上只能唬一唬不学无术的人,并不能吓倒真正的学者。现代一些著名的史学大家并不受潮流的范围,如雷海宗、钱穆、吕思勉、蒙文通。马克思主义学派当然自不待言,使用的都是常见之书、普通的材料。即使最受推崇、最为博学的陈寅恪也并不以罕见材料惊人。普通人也可以做学术,使用普通的、常见的材料也可以做出大学问,而且走的是学术的康庄大道,能做出真正好的学术。花钱买秘密材料,那是财富的表现,“看人人所能看得到的书,说人人所未说过的话”才是学问。

二、平庸之恶

孤立的、碎片化的史料是没有意义的,史料只有在历史的脉络上才能获得理解,只有在历史整体中才具有生命。尤其是过分依赖秘密材料,对公开的材料视而不

见,不能导向正确的结论,只能产生偏僻的观点。秘密材料并不那么重要,在通常情况下,根据公开的材料就足以得出正确的结论,秘密材料只能起到辅助的作用,起到印证的作用。

雷海宗曾说:“多年来中国学界有意无意间受了实验主义的影响,把许多问题看得太机械,太简单。以史学为例:一般认烦琐的考证或事实的堆砌为历史的人,根本可以不论;即是知道于事实之外须求道理的学者,也往往以为事实搜集得相当多之后,道理自然就能看出来,实际恐怕绝不如此。历史的了解虽然凭借传统的事实记载,但了解程序的本身是一种人心内在的活动,一种时代的精神的表现,一种整个宇宙人生观应用于过去事实的思维反应。”⁽⁶⁾蒙文通与雷海宗的学术渊源授受不同,但他们对历史学方法的理解却是一致的。蒙文通说:“治经、治史方法,目的都不同,但也有部分人始终不免以清人治经法治史,就是以考据治史,所以不免于支离破碎,全无贯通之识,这远不如以治诸子之法治史。其实,经学也不是单凭考据可了。考据是工具学问,经、史都用得着,但它却不是经学或史学。也有不谙考据而治史的,却也是缺点。……每一代有些问题还是要从通史中才能求得解决,以免滞固不通。总的说来,学问是循环反复的事。哲学和文学都不可忽视,这对理解历史是大有帮助的。”⁽⁷⁾钱穆对科学派史学的批评最为严厉:“至‘考订派’则震于‘科学方法’之美名,往往割裂史实,为局部窄狭之追究。以活的人事,换为死的材料。治史譬如治岩矿,治电力,既无以见前人整段之活动,亦于先民文化精神,漠然无所用其情。彼惟尚实证,夸创获,号客观,既无意于成体之全史,亦不论自己民族国家之文化成绩也。”⁽⁸⁾

考据被许多人与烦琐等同起来,所谓“烦琐考据”。针对以考据为特点的乾嘉学术,蒙文通指出,有事考据而不囿于考据者,有考据而不烦琐者。蒙文通以自己的学术经验为例现身说法:“几十年来,无论是讲课,写文章,都把历史当作哲学在讲,都试图通过讲述历史说明一些理论性问题。唐君毅说:‘你每篇文章背后总觉另外还有一个道理。’丁山说:‘你每篇考据文章都在讲哲学。’这虽显有推崇之意,却也符合实际。”他说:“文化的变化,不是孤立的,常常不局限于某一领域,因此必须从经、史、文学各个方面来考察,而且常常还同经济基础的变化相联系的。”⁽⁹⁾雷海宗、钱穆、吕思勉、蒙文通等学者都强调通识与通史。不过,通史是一种无形的精神,并非某种外在的形态。尽管顾炎武的《日知录》、赵翼的《二十二史札记》在形态上是清人常用的札记体,但是,蒙文通却认为,它们是“自成体系的通史”。

蒙文通说：“章太炎先生尝言：近人读书尚多未至‘不懂’处。旨哉斯言。”⁽¹⁰⁾对历史没有基本的了解，这样的学术只能是伪学术，这样的教育只能是毁人的“教育”。

三、抓大问题与把握主流

《治学杂语》是蒙文通晚年治学的心得，非常精到。《治学杂语》开门见山地说：

一个心术不正的人，做学问不可能有什么大成就。
……

孟子说：“观水有术，必观其澜。”观史亦然，须从波澜壮阔处着眼。浩浩长江，波涛万里，须能把握住它的几个大转折处，就能把长江说个大概；读史也须能把握历史的变化处，才能把历史发展说个大概。

做学问犹如江河行舟，会当行其经流，乘风破浪，自当一泻千里。若苟沿边逡巡，不特稽迟难进，甚或可能误入洄水沓而难于自拔。故做学问要敢抓、能抓大问题、中心问题，不要去搞那些枝枝节节无关大体的东西，谨防误入洄水沓。

以虚带实，也是做学问的方法。史料是实，思维是虚。有实无虚，便是死蛇。

读基础书要慢点读，仔细读。不仅是读过，而且要熟。更不在多，多是余事。只熟也还无用，而是要思。但思并不是乱出异解，不是穿凿附会，只是能看出问题。

读史，史书上讲的尽是故事，切不可当作小说读，要从中读出问题来，读出个道理来，读出一个当时的社会来。否则，便不如读小说。

……

读书贵能钻进去，并不在于读罕见的书，要能在常见书中读出别人读不出来的问题。⁽¹¹⁾

这是知道之语，通家之言。

蒙文通强调，做学问要抓住大问题、中心问题，如江河行舟，要行其主流，不要拐到小河沟里去，迷失了方向，尤其是不要误入洄水沓。严耕望谈到他师从钱穆治学的经验说，“考证问题亦当以通识为依归”，“虽然始终自觉才气不够，但总想朝大处、远处、高处看”。⁽¹²⁾严耕望批评现代学术过分强调专业分工，期望在狭小的范围内用功，可以做到专精，实际上是缘木求鱼，背道而驰。

中国现当代文学，中国现当代史的研究，诸如所谓“重写文学史”，许多人都在洄水沓里扑腾。人们都说“大江东去”，“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我们湖南地方的人可能会说，怎么能说是大江东去呢？我们家门前的河

明明是向北流的嘛。在湖南，这确实是事实。毛泽东的《沁园春·长沙》就写着“湘江北去”。我们湖南的地理决定了湖南的河流大部分不是向东流入海，而是向北流入了洞庭湖。但是，并不能因为湖南的河流、长江的支流是向北流的，因此就说苏轼的“大江东去”错了。湖南只是中国的一省，湘江只是长江的支流，中国西部青藏高原和东边太平洋西高东低的地势决定了中国最主要的河流是发源于西部青藏高原，向东流入海洋。不能偏于一隅，以支流来否定主流，以局部来否定主体。

我们通常接受了这样一个观点，“文革”时期中国“国民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然而，按照剑桥史的数据，这种说法与事实并不相应。这是《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对“文革”十年与“文革”前十年两个不同时期经济的描述与比较：“整个1958—1965年的国民收入增长率还不到1966—1978年的一半，而在前一时期的投资水平高出后一时期的一倍。简言之，‘大跃进’是一场代价极高的灾难。而‘文化大革命’在其高峰期（1967—1968年）的干扰虽是严重的，但基本上是短暂的，是大多数国家都不时经过的。”⁽¹³⁾显而易见的事实是，“文革”时期较前一时期投资成本降低了一半，经济增长速度却提高了一倍。

“文革”结束以后，一些当代文学批评家仅仅因为政策的变化，因为现行政策否定了集体化，因此，根据这种政策的变化来否定《创业史》等农业合作化题材小说。仅仅根据政策的变化来否定农村合作化题材小说，根本谈不上文学批评。

四、“近人读书尚多未至‘不懂’处”

重要、首要的是要把书读懂，而不要简单地想要有新的史料发现，新的观点发明，不要钻牛角尖，挖空心思找新材料。

章太炎“近人读书尚多未至‘不懂’处”的说法，令人感慨。今天，很多学者连“不懂”这一步都还没有做到，就大发议论，厚诬先贤。现在许多学者谈“劳动的神圣与光荣”。有的学者错误地把“劳动的神圣与光荣”当作社会主义现象。在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劳动确实受到贬低和歧视，但赋予“劳动神圣与光荣”的并不是社会主义，而是资产阶级。“劳动的神圣与光荣”并不是社会主义思想，而是资产阶级思想。“按劳分配”是最重要的“资产阶级法权”。“新时期”以来，许多学者大批“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其实，马克思根本没有发明什么“劳动价值论”。“劳动价值论”是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家的发明，是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洛克、亚当·斯密、大卫·李嘉图等人的观点。马克思的贡献是

在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劳动价值论”的基础上提出了“剩余价值论”。

1875年,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一开始就明确而坚决地拒绝了资产阶级劳动价值论:“劳动不是一切财富的源泉。……一个社会主义的纲领不应当容许这种资产阶级的说法”。⁽¹⁴⁾马克思和恩格斯不是膜拜劳动,而是提出“消灭劳动”:“过去的一切革命始终没有触动活动的性质,始终不过是按另外的方式分配这种活动,不过是在另一些人中间重新分配劳动,而共产主义革命则反对活动的旧有性质,消灭劳动,并消灭任何阶级的统治以及这些阶级本身,因为完成这个革命的是这样一个阶级,它在社会上已经不算是一个阶级,它已经不被承认是一个阶级,它已经成为现今社会的一切阶级、民族等等的解体的表现。”⁽¹⁵⁾

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不会鼓吹什么“劳动的神圣与光荣”,相反,法国马克思主义者、马克思的女婿拉法格提出了“懒惰权”:“可是,无产阶级,这个包括一切文明民族的生产者的伟大阶级,这个在解放自己的同时将把全人类从奴隶劳动中解放出来并使之从动物变成自由人的阶级,竟违背自己的本能,不理解自己的历史使命,让劳动的信条把自己引入歧途!它受到的惩罚是残酷的和严厉的:一切个人的和社会的灾难都出于他们这种对劳动的酷爱。”“有人说,我们今天的时代是劳动的时代。其实,这是痛苦、贫困和蜕化堕落的时代。”“他们从十九世纪初就开始从事的疯狂的劳动是人类最大的祸害,只有当劳动被合理地组织起来并限制在每天三小时之内,劳动才会变成对悠闲懒散生活的一种令人愉快的调剂。”⁽¹⁶⁾

我们一直把“资产阶级法权”简单地视为一个极“左”的概念,“文革”结束后,有的学者甚至可笑地提出要“废”除“资产阶级法权”这个概念。“资产阶级法权”既可能是极“左”的,但也可能是一个保守的概念。列宁在1917年十月革命前夕写的《国家与革命》中说:“马克思不仅极其准确地估计到人们不可避免的不平等,而且还估计到,仅仅把生产资料转归全社会公有(通常所说的‘社会主义’)还不能消除分配方面的缺点和‘资产阶级法权’的不平等,就产品‘按劳动’分配这一点说,‘资产阶级法权’仍然占着统治地位。”“可见,在共产主义下,在一定的时期内,不仅会保留资产阶级法权,甚至还会保留没有资产阶级的资产阶级国家。”⁽¹⁷⁾列宁便直接把苏联的体制称为“国家资本主义”。

中国并不只李大钊持这样的看法,比如著名哲学家冯友兰也持这样的看法。他在著名的《贞元六书》中说:“一种社会制度,是跟着一种经济制度来的;一种经

济制度,是跟着一种生产方法来的。不从根本上着想,不从根本上努力,而只空洞地讲‘应该’,讲‘奋斗’,讲‘法律’,都是无补实际的。”“不从经济制度、社会制度上注意,而只枝枝节节地,要以主观底努力解决妇女问题,是不能成功的。”⁽¹⁸⁾在书中,他甚至也同样使用了“根本解决”这个词。他还说:“中国民族现在当了‘乡下人’,可说是向来未曾受过的侮辱。在历史上中国民族虽也常有军事、政治上的失败,然总还保持着‘城里人’的资格,即较之周围所接触的诸民族,总还是居于经济先进的地位。有人说中国民族富于同化力,其实中国民族在以前所以能同化别民族者,并不是因为他有特别强的同化力,而是靠他的经济先进的地位。我是根本不信:说某个民族始终特具有某一种能力的。只有经济的力量,才是最后的,决定的力。”⁽¹⁹⁾冯友兰无疑是正确的,抓住了根本。中国之所以能够同化其他民族,并不是因为中国的道德与文化水平高,而是因为在中国古代所谓“天下”的范围内,中国的生产方式最先进,经济最发达。然而,19世纪,一旦遭遇经过了工业革命的西方工业化国家,便不堪一击、一败涂地,从军事、文化到心理都发生了彻底的崩溃。

清人讲读书要先识字。不要好高骛远,不要没有学会走就想跑。长期以来,不少人性喜逆反,喜欢做翻案文章,爱搞逆向思维,一门心思去找偏僻的史料。这样容易有“新意”,出“成果”,容易引人注目。学问应该在保守的基础上出新意。所谓推陈出新,不是一把推倒旧的结论,甚至回避与舍弃旧的材料,一味地“逆向思维”。如果没有牢固的根基和基础,可能如沙上建塔,或者像小孩搭积木,是把戏与儿戏。应该先读基本的书,了解基本的史料,读懂基本的书和基本的史料。新时期以来,剑桥史很流行,人人都爱谈顾准、陈寅恪,许多人也可能读过蒙文通,但往往视而不见,没有真正读懂顾准、陈寅恪和蒙文通。许多人把陈寅恪“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当作时髦,时刻挂在口头上,但却并没有真正领会。它意味着立定脚跟,独立不倚,不趋时附势,不追逐新潮,不为潮流所左右,而最根本的在于强烈的“求真意志”。具体落实在陈寅恪自己身上则是:“寅恪平生为不古不今之学,思想囿于咸丰同治之世,议论近乎湘乡南皮之间。”⁽²⁰⁾蒙文通开宗明义就说,心术不正的人不可能有大成就。古人讲正心诚意。学问一定要正,不要投机取巧,不要剑走偏锋,不要寻旁门左道。投机者即使侥幸而邀时誉,也终不可长久。

描写妇女解放的《白毛女》和《红色娘子军》受到贬低,张爱玲的文学受到吹捧。《白毛女》从歌剧到芭蕾舞剧,成了中国现代艺术经典。如果说中国现代文

学艺术有什么东西能够留下来的话,我认为三样东西可能留下来:鲁迅的作品,贺敬之、丁毅创作的《白毛女》,何占豪、陈钢创作的《梁祝》。《白毛女》讲述了中国现代妇女解放的历史。1964年上海芭蕾舞学校将歌剧改编为芭蕾舞剧。最早将歌剧改编成芭蕾舞剧的实际上是日本松山芭蕾舞团,1948年就将其改编成了芭蕾舞剧。芭蕾舞剧《白毛女》和《红色娘子军》成了难以超越的艺术高峰,不论今天用多少钱来堆,也堆不出那样的高度。

如果仅仅就翻译成外语的数量来说,张爱玲无疑可以把任何一位汉语作家都比下去。张爱玲的《秧歌》翻译成了23种语文,《赤地之恋》翻译成了十多种语文。⁽²¹⁾可是,张爱玲的这两部被夏志清吹捧成为现代文学高峰的作品,却是美国宣传机构拟好的写作大纲。最奇妙的是,张爱玲按照美国宣传部门写的书,在解严以前的台湾省也成了事实上的禁书。我们不禁好奇,张爱玲这些盖世杰作,除了夏志清,当时谁是它的知音?谁是它的读者?在《赤地之恋》这部依照美国人的大纲写出来的小说里,张爱玲却反常地突然宣称“所写的是真人实事”。⁽²²⁾王国维在《红楼梦评论》里曾经提出,《红楼梦》的作者和著书年月当为唯一考证之题目。按照张爱玲《秧歌》和《赤地之恋》的写作性质,则其资金之来源及其传播途径与方式亦当为唯一考证之题目。

我不否认张爱玲的艺术才华和她对现代黑暗面的深刻理解。张爱玲之所以在中国现代文学里能够称得上“大作家”,在于她的彻底与极端,在于她对现代性深不见底的黑暗与虚无的深刻理解与描写。鲁迅对现代黑暗面也有深刻的理解,但是,鲁迅却并没有像张爱玲那样因此堕入黑暗。有着“贵族血液”、被夏志清吹到了天上的张爱玲,一见到汪伪政权里一个小小的伪官就低到了尘埃里。在被称为是张爱玲最好、最完美、最深刻的作品《色·戒》中有这样一段话:“英文有这话:‘权势是一种春药。’对不对她不知道。她是最完全被动的。又有这句谚语:‘到男人心里去的路通过胃。’是说男人好吃,碰上会做菜款待他们的女人,容易上钩。于是就有人说:‘到女人心里去的路通过阴道。’”张爱玲及其“张迷”,这些彻底的“经济人”人格的人,可以说是更彻底的“唯物主义者”,只不过,一者是应用于社会结构的分析,一者则证之于个人的人格。

夏志清的小说史把反共冷战的政治宣传品吹捧为杰作,置于民族魂鲁迅之上。这完全是对历史的颠倒。“文革”结束以后,许多人为了打倒鲁迅,不惜给鲁迅加上汉奸的污名。贬低鲁迅和郭沫若不是孤立、个别、偶然的现象,而是后面存在一个巨大的发生“装置”。这

个装置当然不是李斌所说的“为学术而学术”,而是一个政治装置,明确地说,就是妖魔化左翼与革命的政治装置。因为郭沫若不仅是继鲁迅之后左翼文学和左翼文化的代表和旗帜,而且是公开树起反抗蒋介石和国民党大旗的第一人。身为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政治部副主任、中将军衔、为蒋介石所倚重的郭沫若,1927年3月31日写下了著名的讨蒋檄文《请看今日之蒋介石》,揭露蒋介石叛变革命的真相,独自一人率先举起了反抗蒋介石的大旗。此时,距离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距离共产党发动八一南昌起义,还有时日。后来,他参加了著名的南昌起义;但是,当时,他和宋庆龄等许多列名于南昌起义的领袖人物一样,并不是共产党员,而是国民党员。他是在南昌起义失败以后共产党最倒霉的时候才加入共产党的。而这个时候,不少原来的共产党员在国民党的白色恐怖和血腥屠杀之下纷纷脱离、背叛了共产党,不少人不惜出卖自己的同志以换取自己的苟活或者荣华富贵。郭沫若却为了大义而毅然抛弃了许多人渴望而不可得的高官厚禄、荣华富贵。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郭沫若别妇抛雏,从日本秘密回国参加抗战。佐藤富子在她的丈夫不辞而别回国以后,这样写道:“反顾为全中国而生活的人,中国才是必要的,而只顾着个人,在中国怕是多余的吧。一个人的力量并不大,但只要像郭那样向这方向进行——虽说是微力——我也很可以为郭之妻而无愧了。”⁽²³⁾

早在“文革”前,郭沫若就已处于风雨飘摇之中,他生命和家庭的航船四面都是暗礁和险滩。“文革”发生,他首当其冲地被列为批判对象,后来他和范文澜两人被毛泽东列为保护对象,却仍然难逃浩劫,乃至家破人亡。郭世英之死,令许多人至今惋惜不已。当他的生命被强行终止之时,年仅26岁。牟敦白视郭世英为“心中的偶像”:“一想到郭世英兄弟,随即大彻大悟。他们愤世嫉俗,为做人的尊严,为了理想,不惜付出生命的代价。”郭世英的话令我们陷入巨大的悲痛与深深的绝望:“如果你是一个有良知良心的人,讲真话的人,生来便是不幸的。”⁽²⁴⁾周国平将郭世英称为“最具人性魅力的一个人”。他这样描述北大时候的同学郭世英:“我格外鲜明地感觉到,眼前这个人属于一种我未尝见过的类型,其特征是对于思想的认真和诚实,既不愿盲从,也不愿自欺欺人。”⁽²⁵⁾郭家的孩子为什么在那个时代能够达到理想的人性的顶峰,让众人仰望呢?

人们普遍非议郭沫若“文革”时期的学术著作《李白与杜甫》。周国平是这样理解的:“《李白与杜甫》初版于1971年,其开始写作应在1968年。正是在连丧二子之后,心中有无法表达的痛苦,也有不能直言的愤

懋,需要寻找一个话题说出来,他找到了与他天性最相近的李白。我曾在一篇文章中分析:在这本书中,郭老褒扬李白性格中天真脱俗的一面,批评其看重功名的一面,而最后落脚在对李白临终那年写的《下途归石门旧居》一诗的诠释上。他对这首向来不受重视的诗评价极高,视之为李白的觉醒之作和一生的总结,说它表明‘李白从农民的脚踏实地的生活中看出了人生的正路’,从而向‘尔虞我诈、勾心斗角的整个市俗社会’‘诀别’了。”⁽²⁶⁾

1973年8月5日,毛泽东写了著名的七律《读〈封建论〉呈郭老》:

劝君少骂秦始皇,焚坑事业要商量。
祖龙魂死秦犹在,孔学名高实秕糠。
百代都行秦政法,十批不是好文章。
熟读唐人封建论,莫从子厚返文王。

在当时,将某个人与儒家或孔夫子联系起来是一个极其严重的指控。当时正在中国访问的基辛格对同毛泽东和周恩来会谈中发生的两个插曲印象极为深刻:“毛很少毫不含糊地支持一派;他通常总要保持机动的自由。很可能在他采纳周的政策的同时,他个人至少还赞成周的某些反对派。这可以说明他为什么在谈话中间突然问我是否见过‘懂德语’的郭沫若——虽然在此以前‘懂德语’并不是同我见面的前提。当我说我还从未见过这位先生时,毛泽东说:‘他是尊孔派,但现在是我们的中央委员。’我为什么要在一场批孔运动中去见一位尊孔派呢?中国又有谁能够如此胆大妄为地安排这种会见呢?……我在结束1973年11月这次访问以前,看到了正在迫近周恩来的某些压力。在最后一次宴会上,那种节日气氛和开怀的祝酒使我情不自禁提出了孔夫子问题。我的脑袋一定是给时差的多次变化搞糊涂了,要不就是茅台酒喝得太多使我有醉意。我现在无法解释我当时为什么要提出这个具有爆炸性的主题。我不揣冒昧地说,中国好像很自然地把国家看成是调节人们的行为、道德和政治活动的一个庞大的教育机构;就这个意义而言,中国从来都是信奉儒家的。我还说,这种概念似乎仍然存在,尽管现在教育的内容不言而喻是同儒家学说针锋相对的。这个说法以罕有的冒失方式实质上把毛泽东也叫作儒家了。周恩来一听就沉不住气了——这是我从来没有见过的,尽管只有翻译听见了我的话,他还是十分激动地坚决指出这种类比是荒谬的。虽然我申辩说他应当把我的任何误解当作无知的表现,他也拒绝接受。”⁽²⁷⁾周恩来被基辛格视为

机智、完美的领袖人物,但是,当基辛格提到孔夫子的时候,却表现出来了从未有过的慌乱与失态。

1974年1月25日,在一万八千人参加的中央和国家机关“批林批孔”动员大会上,江青在讲话中公开毛泽东见她时对郭沫若的批评,两次令这位82岁的老人在大庭广众之下站起来蒙受羞辱。⁽²⁸⁾

吴宓是一个通体透明的人,一位令人心生敬意和无比信任的学者。他自始至终都坚持记日记。吴宓日记是一部既充满血泪又最令人信任的20世纪知识分子史。在“文革”的时候,即使他写的日记会给他带来厄运,他也仍然坚持记日记——即使可能当即就会被红卫兵毁掉。

陈寅恪与汤用彤是吴宓自始至终最敬重的两位学者。吴宓与陈寅恪都以遗民自居。可贵的是,尽管吴宓在立场上与共产党对立,但却并没将共产党妖魔化。他只认事实和道理。尤其是,他是激烈地反对新文学和新文化运动的主将。但是,他对新文学作家却并无偏见,而是从事实出发,对茅盾的创作给予崇高评价:“在舍读小说《子夜》,趣味甚浓。茅盾(沈雁冰)诚不愧为中国之巴尔扎克,有志欲做中国此时代之社会风俗史,惜所成书仅三四部耳。”⁽²⁹⁾

吴宓日记具有珍贵的史料价值。他在1964年日记中写道:“昨今广播告全校,世界青年参观团来校应如何整洁,特告戒(诫)见时不许多言,尤禁用外国语,等等。可谓尽宣传作伪之能事矣。宓按共产党之兴与其成功,实由其人务实崇真,艰苦奋斗;今得国略久,而诸种设施专务虚文,不求实益,章训琐屑,命令纷繁。又惟事宣传,以蒙蔽耸动为能。窃疑共产党将自此衰乎?”⁽³⁰⁾他在“文革”高潮的1966年的日记中写道:“中国之右派知识分子亦皆爱国、尊党、敬仰毛主席,决无思造乱、叛国者,其争权好名、喜读旧书、偶吟诗题画者,则有之耳(但皆绝不望政局之改变与外敌之侵入)。”⁽³¹⁾

吴宓在1961年9月3日日记中忠实地记录了陈寅恪对共产党的态度:“解放后寅恪兄壁立千仞之态度:人民政府先后派汪篔、章士钊、陈毅等来见,劝请移京居住,寅恪不从,且痛斥周扬。”⁽³²⁾陈寅恪痛斥周扬,但吴宓却对郭沫若充满了敬意。读吴宓1955年的日记,他对时代风气的激烈针砭与对郭沫若的敬重形成了鲜明对照。“昔之数十年中,吾侪与全中国同心同道之士,固皆有完全之自由。以反抗、攻诋、辩驳,甚至辱骂胡适等人,以明真是而存正气,以保国粹而存文化。呜呼,在今则如何者,吾侪乃如犬之摇首摇尾于主人之前,主人指某人为盗,犬即向之狂吠,宁敢稍吠途中之行人,更勿言主人之亲与友矣。”⁽³³⁾他对全国动员舆论声讨胡风

一事表达了强烈不满：“宓愤甚，谓胡风有罪，党与政府径可惩诛之，何必令全国人士一一声请致讨，此与昔之制造民意，其伪何异？”⁽³⁴⁾他记录了对思想改造运动的反应：“惟厉言思想改造为今最紧迫之急务，谓共党决于八年内完全改变全国尤其五百万知识分子之思想，使全信奉马列主义唯物论之世界观，而专心为社会主义服务。……宓聆后深感苟活之痛苦，惟祈早死而已。”⁽³⁵⁾“盖少年助教人人想作李希凡、蓝翎，急于自见。”⁽³⁶⁾但他读郭沫若的著作却似乎进入了另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又读郭沫若《青铜时代》，……此郭君所见，皆远在胡适之上。”⁽³⁷⁾“翻阅郭沫若译《浮士德》一二部，盖于百忙中辛苦译成（1943）者，可佩。”⁽³⁸⁾

美国华裔学者张光直在1981年发表的《考古学和中国历史学》中对郭沫若在考古方面的成就与贡献做了如下盖棺论定的评论：“1927年，蒋介石与共产党决裂并大肆围剿共产党员，郭沫若被迫逃亡日本，过了10年的流亡生活。这10年，郭氏集中精力研究中国的古代遗物，撰著了数种不朽著作：《中国古代社会研究》（1930年）、《两周金文辞大系》（1932年）、《卜辞通纂》（1933年）、《两周金文大系图录》（1934年）。这些著作及其他流亡日本时期撰写的关于古代中国的著作，无疑奠定了郭沫若在中国古代研究方面的巨人的地位。他在甲骨文、金文和青铜器风格演变方面的开拓性著述，至今仍是不可或缺的。所以，尽管郭沫若在中央研究院有许多政治上的反对者——特别是李济，但出于对他在上述领域的杰出贡献的尊重，1948年他们仍然推选郭氏为中央研究院第一届院士（具有讽刺意味的是郭氏拒绝接受）。”⁽³⁹⁾

周扬被称为中国的日丹诺夫、文艺沙皇，郭沫若则被称为中国的歌德。恩格斯在《诗歌和散文中的德国社会主义》中这样评论歌德：“在他心中经常进行着天才诗人和法兰克福市议员的谨慎的儿子、可敬的魏玛的枢密顾问之间的斗争；前者厌恶周围环境的鄙俗气，而后者却不得不对这种鄙俗气妥协、迁就。因此，歌德有时非常伟大，有时极为渺小；有时是叛逆的、爱嘲笑的、鄙视世界的天才，有时则是谨小慎微、事事知足、胸襟狭隘的庸人。”⁽⁴⁰⁾在郭沫若的身上也体现了同样的矛盾性与两重性。无论郭沫若身上有怎样的弱点，他的方向和道路是正确的。被民国尊奉为“国父”的孙中山，可议之处多矣，并且至今非议不断。孙中山逝世后，针对讥笑糟蹋他的丑类，鲁迅写了著名的《战士与苍蝇》：“有缺点的战士终究是战士，完美的苍蝇也终究不过是苍蝇。”

我们不要被表象迷惑，也不要被潮流席卷，要有自己独立的思考与判断。五四新文化运动后，鲁迅与胡适

分道扬镳，对胡适的轻蔑溢于言表，并非偶然。胡适在通过傅斯年转呈蒋介石的信中说：“我因为很愿意帮国家政府的忙，所以不愿意加入政府。……我在野，——我们在野，——是国家的、政府的一种力量，对外国，对国内，都可以帮政府的忙，支持他，替他说公平话，给他做面子。”⁽⁴¹⁾蒙文通说：“读书不仅要从文字记载中看出问题，还要能从不记载处看出问题。不记载也从另一个方面反映了问题。”⁽⁴²⁾读书不仅要在有字处读，而且要在无字处读，要前后左右之书比较研读。现在使用日记做研究成了一种流行的风气，不少人利用蒋介石、胡适的日记做研究。胡适日记就有许多空白。⁽⁴³⁾例如，胡适几乎事无巨细都有记录，可是，恰恰他收受蒋介石的巨款，日记却没有记录。许多人只看到胡适表面上受到蒋介石礼遇，然而，实际上，蒋介石却在日记里对他充满鄙视，放肆咒骂。美国华裔历史学家汪荣祖曾经这样评论胡适与蒋介石的关系：“蒋介石在表面上对胡适的礼遇与尊重，过度夸大了胡的影响力，民众不免对胡有过度的期盼。其实，胡在蒋面前并无招架之功，因蒋自以为有恩于胡，而胡亦不能自外于蒋，虽欲置身于体制之外，然大使、院长皆为蒋所授之官，实已参与了蒋政府，更何况暗中接受蒋私下金钱的馈赠，从国史馆所藏蒋介石嘱俞国华电文可知，自1951年至1955年间，胡一共收了蒋九笔钱，总金额45000美元，难怪蒋私底下如此瞧不起胡，甚至骂胡是‘无耻政客’。在这种蒋胡关系的框架里，胡适所领导的自由民主，只能成为专权者的点缀，而其本人在独裁者的眼里又是何等的卑下与屈辱。”⁽⁴⁴⁾

哲学家怀特海说：“我们对中国的艺术、文学和人生哲学知道得愈多，就会愈加羡慕这个文化所达到的高度。几千年来，中国不断出现聪明好学的人，毕生献身于学术研究。从文明的历史和影响的广泛来看，中国的文明是世界上自古以来最伟大的文明。”⁽⁴⁵⁾但是，近代以来，在帝国主义侵略下，中国长期陷于亡国灭种的边缘，中国人彻底丧失了民族自信和自尊。直到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才从根本上扭转了这种沉沦的趋势，使中华民族重新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近年来，形成了一个民国化妆运动，造出了“民国范儿”之类名词。对民国时代的无端美化肉麻吹捧，只能说明今天的“民国范儿”的无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来自于1935年拍摄的电影《风云儿女》中的主题歌曲《义勇军进行曲》。“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是对民国这个山河破碎、民族沉沦的时代的记忆。让我们回到历史，听听真正的“民国范儿”的心声吧。在五卅运动的前一年，1924年，徐志摩说：“让

我们痛快地宣告我们民族的破产,道德、政治、社会、宗教、文艺,一切都是破产了的。我们的心窝变成了蠹虫的家,我们的灵魂里住着一个可怕的大谎!”⁽⁴⁶⁾ 1937年7月7日,中国全面抗战爆发以后,陈寅恪说:“寅谓中国之人,下愚而上诈。……抵抗必亡国,屈服乃上策。”⁽⁴⁷⁾

结 语

现代学术强调分科研究,唯新是求,这是现代学术的显著特点。现代学术,既有长处,也有缺陷。对于现代学术潮流本身,我们要有反省的能力。过分强调创新,可能导致刻意立异。于是,似乎前人做的是正题,我们就只能做反题;前人说了真理,我们就只能讲歪理。如果我们也吃饭,何来创新?其实,学术的本质,历史的精神,不是追求新史料,制造新观点,而是实事求是,追求真理。

华裔学者叶维廉所强调的“历史整体性”对于历史研究来说十分重要。叶维廉在《历史整体性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之省思》中针对普实克与夏志清的争论说:“我们必须承认,大陆的批评家或‘左’倾的其他批评家应该是讲求历史的,虽然太偏颇了些。他们的问题出在未认清他们的历史见解只是暂行的,未认清他们以偏概全的妄误。但另一方面,那些自称是超历史的批评家却往往是违背历史的。”⁽⁴⁸⁾“文革”结束后,某些“超历史的批评家”将夏志清的偏见奉为真理,用来“重写文学史”,其实,这并非“超历史”,而是在根本上脱离了历史和违背了历史。

“要看书,不要只抱个题目去翻材料。”严耕望这一告诫值得我们谨记,不然就会跑偏和蹈空。所谓材料并非天然就是材料。杜甫的诗歌在五代的时代不是材料,经过了五代的散失,到宋代受到人们的珍重,就成了材料。去年出版的洪子诚老师的《材料与注释》一书受到重视。值得注意的是,这本书的材料不是“挖掘”出来的,它们在洪老师的身边已经待了几十年。出之自然的材料,才是好材料。水到渠成的学问,才是真学问。

2017年11月8日

注释: -----

- (1) [德] 马克斯·韦伯:《以学术为业》,《学生与政治:韦伯的不由自主演说》,冯克利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48页。
- (2) 司马迁:《太史公自序》,《史记》第10册,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3293页。
- (3) 严耕望:《治史经验谈》,《治史三书》,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21-22页。
- (4) 鲁迅:《致台静农》(1932年8月15日),《鲁迅全集》第12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102页。
- (5) 陈寅恪:《陈垣〈敦煌劫余录〉序》,《金明馆丛稿二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第236页。
- (6) 雷海宗:《历史警觉性的时限》,王敦书选编、雷海宗著《历史·时势·人心》,天津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104页。
- (7)(9)(10)(11)(42) 蒙文通:《治学杂语》,蒙默编《蒙文通学记》,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3年版,第38-39页,第6页,第33页,第1-3页,第1-3页,第15页。
- (8) 钱穆:《国史大纲·引论》,《国史大纲》(修订本),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4页。
- (12) 严耕望:《钱宾四先生与我》,《治史三书》,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259页、第278页。
- (13) [美] R. 麦克法夸尔、费正清编:《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中国革命内部的革命:1966—1982年》,谢亮生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507页。
- (14) [德] 卡·马克思:《哥达纲领批判》,《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15页。
- (15) [德]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78页。
- (16) [法] 拉法格:《懒惰权——驳斥1848年“劳动权”》,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国际共运史研究室编《拉法格文选》上,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71-81页。
- (17) [苏联] 列宁:《国家与革命》,《列宁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51页、第256页。
- (18) 冯友兰:《新事论·谈儿女》,《三松堂全集》(第3版)第5卷,中华书局,2014年版,第316-318页。

- (19) 冯友兰:《中国现代民族运动之总动向》,《三松堂全集》第14卷,河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265页。
- (20) 陈寅恪:《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下册审查报告》,《金明馆丛稿二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第252页。
- (21) 庄信正:《张爱玲致庄信正》(1966.10.19)注解:“张爱玲一九六九年所写履历中提到那时 The Rice-Sprout Song 已被译成二十三种语文, Naked Earth 也有十几种译文。”庄信正编注《张爱玲庄信正通信集》,新星出版社,2012年版,第16页。
- (22) 张爱玲:《赤地之恋》,皇冠文化出版有限公司,著作完成日期:1954年,初版:2010年8月,第3页。
- (23) 佐藤富子:《我的丈夫郭沫若》第4页,汉口:1938年5月14日初版,1941年5月20日再版。
- (24) 牟敦白:《X诗社与郭世英之死》,廖亦武主编:《沉沦的圣殿》,新疆青少年出版社,1999年版,第17-27页。
- (25) 周国平:《流星般划过的生命——回忆我的同学郭世英》,《文史博览》2005年第5期。
- (26) 周国平:《“北大”那些事》,《档案天地》2013年第3期。
- (27) [美]亨利·基辛格:《动乱年代——基辛格回忆录》第2册,张志明译,世界知识出版社,1983年版,第336-337页。
- (28) 冯锡刚:《郭沫若的晚年岁月》,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320页。
- (29) 吴宓:《吴宓日记续编》第7册(1961—1962),吴学昭整理注释,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年版,第51页。
- (30) (34) (35) 吴宓著、吴学昭整理注释:《吴宓日记续编》第2册(1954-1956),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年版,第60页,第189-190页,第200-201页。
- (31) 吴宓:《吴宓日记续编》第7册(1965—1966),吴学昭整理注释,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年版,第472-473页。
- (32) 吴宓:《吴宓日记续编》第5册(1961—1962),吴学昭整理注释,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年版,第166-167页。
- (33) 1955年4月11日,吴宓著、吴学昭整理注释:《吴宓日记续编》第2册(1954—1956),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年版,第148页。
- (36) 1955年4月20日,吴宓著、吴学昭整理注释:《吴宓日记续编》第2册(1954—1956),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年版,第156页。
- (37) 1955年6月6日,吴宓著、吴学昭整理注释:《吴宓日记续编》第2册(1954—1956),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年版,第191页。
- (38) 1955年12月8日,吴宓著、吴学昭整理注释:《吴宓日记续编》第2册(1954—1956),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年版,第329页。
- (39) [美]张光直:《考古学和中国历史学》,陈星灿译,《中国考古学论文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年版,第27-28页。
- (40) [德]恩格斯:《诗歌和散文中的德国社会主义》,《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256页。
- (41) 胡适:《致傅斯年》(1947年2月6日,由傅斯年转呈蒋介石),《胡适全集》第25卷,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220页。
- (43) 以胡适日记空白为题的,比如欧阳健《从日记的缺失看胡适的红学》,《内江师范学院学报》2017年第1期;欧阳健《被胡适日记“隐去”的俞平伯》,《粤海风》2017年第3期。
- (44) 汪荣祖:《当胡适遇到蒋介石:论自由主义的挫折》,潘光哲主编:《胡适与现代中国的理想追寻》,秀威资讯科技,2013年版,第47页。
- (45) [英]A.N. 怀特海:《科学与近代世界》,何钦译,商务印书馆,2009年版,第10页。
- (46) 徐志摩:《落叶》,赵遐秋、曾庆瑞、潘百生编:《徐志摩全集》第3卷,广西民族出版社,1991年版,第9页。
- (47) 吴宓记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以后陈寅恪的谈话,见《吴宓日记》第6册,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168页。
- (48) 叶维廉:《历史整体性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之省思》,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244页。与2003年安徽教育出版社,《叶维廉文集》第2卷,文字上略有出入,《叶维廉文集》本显然被编辑过。

(作者单位:清华大学人文学院)

(责任编辑:张涛)